



民族文化研究文集

7

责任编辑：张仲仁

装帧设计：蒋力

彝族文化研究文集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大营路59号)

云南民族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125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220

ISBN 7-5367-0103-9

G·29 定价：2.10元

谨以此书献给
楚雄彝族自治州建州
三十周年州庆

序 言

彝族文化的丰富遗产，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就已引起中外学者的注意。但是，全面系统的研究彝族文化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十年代初，为了推动彝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广大彝族地区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同时收集和整理了数以百计的彝族民间口传史诗和彝文古籍，其中不乏珍品，如《梅葛》、《查姆》、《阿细的先基》、《阿黑西尼摩》、《阿诗玛》、《勒俄特依》、《西南彝志》、《宇宙人文论》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适应新时期的要求，一九八〇年楚雄州成立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室，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彝文古籍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一九八三年，为了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原楚雄彝族文化研究室的基础上，扩建成立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刘尧教授为所长，进一步开展了对彝文古籍、社会历史、民间文学艺术等彝族文化的全面研究。标志着楚雄州彝族文化研究的又一个新的起点。

人类社会历史表明，每一个民族在面临自己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都伴随着民族新文化的超前发展，譬如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等等。民族新文化运动从社会结构的深层，诱发和培育社会新因素，深刻而又广泛的影响

着社会的发展。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对彝族文化的发掘、整理和深入研究，继承和发扬了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是新文化繁荣的正确选择，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因此，一开始就得到了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族同胞的热情支持，得到了国内文化界的关注。

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众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具有悠久历史的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国著名的文化思想家蔡尚思先生在《中国各民族的血统与文化》一文中指出：要研究中国文化，就必需注重少数民族的文化研究。并说：

有了各兄弟民族的文化史，才能写出真正能够代表中国各兄弟民族的中国通史、中国文化通史之类的著作。

对于彝族文化的研究，中国先秦思想家杨向奎先生生前指出：

我们不读中国各民族史，各民族文化史，就不了解中国古代文明之所以光芒四射；我们不读彝族历史、彝族文化史、《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更不能透彻了解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些难解的问题以及中华民族文化之综合构成的体系！

福言、倪译则在《云南高原上的文化研究展望》一文中指出：

彝族文化研究在“非儒文化”研究中，追本溯源、揭明汉族由各少数民族混合形成中的主体民族是古羌戎或氐羌，即彝族等的先民，而且发现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主要源头也是羌戎文化，而保存较多羌戎文化的则是云南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彝族文化。这样，彝族文化学说牵动中国文明史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可见，把战略重点转移到“非儒文化”的研究上，将是今后文化研究取得突破的关键。

彝族文化研究还只是一枝含苞待开的小花，但已经为中华文化百花园增添了光彩，同时也为自身的发展辟出了蹊径。

从《彝族文化研究文集》第二集里，我们可以窥见彝族文化研究和发展之一斑。在本书的作者中，一部分同志是差不多与楚雄彝族自治州同时诞生的，在建州三十周年之际，他（她）们能够以自己的成果迎接自己的节日，这对我们来讲，不能不是一种欣慰。我们从中看到了彝族文化的未来和希望。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彝族文化的研究还很年轻，甚至还带有不少稚气，就我们目前的队伍状况来讲，也还比较薄弱，这是与我们古老的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很不适应的，亟需努力加强。同时，就现在全国多数彝族地区来看，至今还是一个经济文化不发达地区。因此，彝族文化的研究，需要加强发展性探索，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指导，认识州情、地情，探索发展规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在庆祝楚雄彝族自治州成立三十周年的时候，谨向长期以来关注、支持和帮助我州发展民族文化的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表示衷心感谢！

楚雄彝族自治州州长 普联和

目 录

- 黄显功**：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新座标
——评介中华彝族文化学派和《彝族文化研究丛书》
- 周民锋**：大胆的立论
——评《中国文明源头新探》
- 王连芳**：略论彝族的四个特点
- 卢央、刘尧汉**：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发现和证实过程及其与中华文化的普遍联系
- 李树华、刘尧汉**：峨山彝文古籍和民间传说中的十月历及其向天坟“团坟”
- 余宏模**：论彝族文字的起源和发展
- 杨和森**：彝族创世纪戏剧《搓特基》的民族学意义
- 唐楚臣**：灶神溯源
- 朱瑶元**：彝族“四方八虎”图的哲学科学意义
- 普珍、刘小幸**：祖灵葫芦与羲炎黄
- 段志刚**：彝州考古
- 什列·伍合尔基**：凉山彝族父系氏族奴隶制的基本特征
——附：纳吉氏族成员龙云及其系谱
- 曲木约质**：四川凉山彝族土司岭帮正的世系
- 夏扬**：试谈楚雄彝族反映远古社会的几个民间文学资料
- 芮增瑞**：论彝族《哭嫁歌》
- 韦绍翔**：论彝族原始神话的美学价值

巴莫曲布嫫：从彝族民间文学看彝族人民的审美观

李世忠、孟之仁：彝族星回节源流考

韩国良：《梅葛》中的虎、雪和葫芦

李明译：疑《楚辞》中有彝语

杨凤江：用彝语探索《白狼歌》

钱成润、杜晋宏、史岳灵：彝州易村产业结构变革五十年

龙建民：从西南彝族社会生活中的以物易物看交换的产生与发展

和宁、邓超：贫困山区的选择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经济发展状况调查的综合报告

寇发：楚雄彝州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王敏：改革九年的楚雄彝州农村经济

——一批各有特色的区域商品经济雏形正在形成

李世忠、普廉、孟之仁：楚雄彝州大麻生产和销售情况

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新座标

——评价中华彝族文化学派和 《彝族文化研究丛书》

黄显功

近几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再次形成了一股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思潮。学者们从各个历史角度，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广泛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多层次的探讨。这种对传统文化进行的反思与寻根，既是处在文化变革与冲突时期人们痛苦的冷静回顾，也是中华民族谋求兴盛，追索前途的社会心理的极积表现。中华彝族文化学派就是近几年崛起于中国大陆的一支学术新军，他们的主要成就集中地体现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之中。

《彝族文化研究丛书》由中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历史学家、彝族学者刘尧汉先生主编，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著作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中国考古天文学的一大发现——彝族向天坟的结构与功能》、《市场起源论》、《图腾层次论——从彝族的图腾层次考察夏、商、周的原生图腾》、《彝族的占卜与西方未来学》、《彝族的火神话与中华民族火文化》、《彝族虎星占的哲学和科学意义》、《彝语支地名与中国民族地名学》、《凉山彝族星占师海惹巴瑞回忆录》以及《彝族“沙村”五百年》、《彝州“禄村”今

昔》、《忆往昔》等。这些著作均以其独到的视角与方法，运用文献、考古文物、调查记录和口碑材料，深刻而新颖地揭示了彝族的社会经济、宗教信仰、科学技术、哲学民俗等历史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从这些著作的研究课题和所叙述的内容深度与广度来看，具有广阔的纵横感，构成了一个多方位的学术坐标体系。彝族文化学派作为中国第一个族别文化研究体系，不仅体现了中国民族学、民族史研究的新壮举，而且是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突出标志。

彝族主要分布在金沙江南北两侧，是我国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的主要土著居民，现有人口五百四十万（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是我国五十六个少数民族中人口居于第四位的民族，由于彝族居于西南的山野僻壤，其经济、文化历来被人视为原始而落后。所以，人们对这个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的研究还不很深入。现在彝族在云南省楚雄市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研究所——彝族文化研究所，率先在国内开展了专项族别文化研究，形成刘尧汉等先生为核心的彝汉学者群。彝族学者刘尧汉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研究员，兼任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所长，长期致力于彝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他的成果在五十年代就被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赞为“山野妙龄女郎”。范老曾说：“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总喜欢在画像上和《书经》、《诗经》等等中国的名门老太婆或者希腊、罗马等外国的贵族老太婆打交道，对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就未免有些目不邪视，冷淡无情。事实上和死了的老太婆打交道，很难得出新的结果，和妙龄女郎打交道却可以从诸佛菩萨的种种清规戒律里解脱出来，前途大有可为。”（《光明日报》，1956年5月24日《史学》专栏）因此，彝族文化学派具有一个突

出的特点，即“把山野中采摘到的‘鲜果’与书斋中的‘干果’相结合，即用活史料给死史料注射新鲜血液，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见刘尧汉《彝族文化研究丛书》总序）。所以，彝族文化学派的学者们尤其重视社会历史调查。他们长年驱驰于滇、川、黔三省的彝族聚居地，获得了一大批鲜为人知的新资料，既补充了文献史料的不足，又使原有文献史料中的疑难找到了较为圆满的解释；它不仅使湮没于山野中的彝族文明之珠重放光彩，而且还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一个“谜”。

彝族文化学派以1984年出版的《彝族天文学史》开其先河，随后出版的《中国文明源头新探》、《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二书为其主要基石。《彝族天文学史》是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的天文历史著作，它奠定了彝族文化学派的资料与论证基础，以不同凡响的面貌呈现于学术界。彝族文化学派以其著作表明，中国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汉族文化则是在吸收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由于历时遥远，已难一一具体察明其渊源，人们常认为：“中国失礼，求之四夷。”就是说汉族失掉的文化制度，可以从少数民族中找回来，也就是说少数民族的文化都是从汉族学来的。现在，我们从《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中可以断言，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中国历史上很多科学文化恰恰来源于汉族产生之前的“夷”、“戎”“蛮”、“狄”等“四夷”。彝族是中国古羌戎（或氐羌）的遗裔，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彝族至今仍保存着很多羌戎和早期的中国文化。因此，通过对彝族的历史文化的整理与研究，不啻是在探索中国文明的源头。

《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从科技史研究入手，进而打开了彝族文化及中国文化的研究大门。这是彝族文化学派的一个重要特色。他们首先在彝民中发现湮没了数千载，人所未闻的“十月

太阳历”。在习用阴阳历的中国，已知的太阳历（即阳历）只有北宋沈括的十二月气历和太平天国时期在江南行用过短时间的天历。所以，十月太阳历的发现不仅在科技史上有探骊索隐，兴微继绝之功，而且还以其丰富、深刻而科学的内涵令人茅塞顿开。据研究，“十月太阳历”源自远古伏羲时代，与虎图腾密切相关，它曾是夏代使用过的历法，商周时期在民间也运用过。但人们囿于十二个月的阴阳历系统，对此一直未予重视。然而，当我们知晓残存在彝族中的“十月太阳历”每年有十个月，每月三十六天，以十二属相轮回纪日，一年五季，以土、铜、水、木、火代表（五行），每季两月，分为雌雄（阴阳），三十个属相周为一年，余下的五至六天作为“过年日”后，令人欣喜地发现，我国古代典籍中的有关记载将予以重新认识。如被我国奉为历法圭臬的《夏小正》不是农历（阴阳历），而是略有改动的“十月太阳历”；《管子·幼官篇》记录的一年有三十个节气，也非虚妄无稽之语，恰恰是“十月太阳历”每属相周设一个节气的佐证；被人津津乐道的《诗经》中的《豳风·七月》和《小雅·十月之交》正是“十月太阳历”的形象写照，而非二千年来注释家们所说的十二月阴阳历。“十月太阳历”的学术价值除了天文历法的范畴之外，还深深地影响和导致了中国的科学、哲学与思维等有关概念和文化传统的形成。众所周之，“阴阳”、“五行”、“八卦”是中国文化中渗透甚广，最具特色的科学与哲学观念，但对其产生和原始象征意义一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彝族文化学派认为这些古老的观念均是在“十月太阳历”的概念基础上产生的，原本并无神秘的意义。这个具有大量证据的论断，犹如石破天惊，令人耳目一新，无疑是中国科技史与哲学史研究的一大突破，并且为我们认识中国文化的发展的逻辑性提供了深刻的例证。其重要性正

如著名史学家杨向奎先生在《文明中国的十月太阳历》序言中所说：“我们不读彝族历史、彝族文化史、便不能透彻了解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些难解的问题以及中华民族文化之综合构成的体系！”

确实，研究中国文化史再也不能停留在汉族和汉语文献上了。因为，汉族只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汉族文化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的文化，并且，汉族是由许多民族长期融合而成的，它的文化基础是古代各民族的文化。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客观地存在着汉族与其它古代民族在人口数量上由少增多与由多变少的消长情况，这种民族人口的历史变动，在文化人类学上，不仅反映了社会经济形态的进化，而且还标志着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取长补短。因此，不花大力气去研究中国汉族以外的各民族文化，就不能客观完整地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同样，仅仅依据汉语文献来研究中国文化也是很不够的，如我们文化史研究中的许多“谜”，与其说是文献残缺，记载不明，倒不如说是我们的研究方法和开拓与鉴别史料的手段刻板。笔者认为，中国的文献记载虽然汗牛充栋，但它所描述的东西并不能囊括中国真正的历史文化，如果冀以在故纸堆中，依靠文字的排比，词句的训释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话，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活生生的东西是无法解释得圆满的。所以说，中国文化的伟岸身躯实在是过于狭小了，必然会捉襟见肘，屡现破绽，产生一大串令人头痛和争吵不休的“谜”来。彝族文化学派和《彝族文化研究丛书》的出现，恰好弥补了中国文化的锦绣之衣的不足，他们在人们冷落的领域，理丝缀珠，编织出了耀人眼目的锦缎！

《彝族文化研究丛书》在阐释具体的中国历史文化专题的同时，在理论上也有突出的贡献。如凭籍对彝族向天坟的研究，

建立了中国考古天文学的初级体系，为今后开展古遗址的考古天文研究在方法论上奠定了基础；创立了“图腾层次”理论，首次发现了“图腾”有原生、演生、再演生等多层次形态，为人们研究上古史和民族学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手段；对谁占有土地，谁就有权势的传统理论进行了探索性的发展，指出在川滇凉山彝族的父系氏族奴隶制社会中，占有土地者并不有权势，而占有人身者的奴隶主才有权势，占有土地的奴隶可向其他奴隶甚至他的奴隶主出租土地，从而补充了土地租佃制度研究理论的空白。此外，《彝族文化研究丛书》在方法论上尤具特色，它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文献、考古和社会调查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以纵横交错的座标式体系，在时空上，跨越近万年，驰骋国内外。不仅探索古代历史，而且还研究现实社会，既发掘彝族和中国本土上的文化遗产，同时追溯了当代国外某些学说的渊源。所以，丛书的社会历史氛围是相当丰富多彩的。由此所产生的著作均有综合性与边缘性的特色。总之，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诞生和《彝族文化研究丛书》的问世，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历史文化座标，对促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随着这个学派的发展，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的研究，将会日益显示其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大 胆 的 立 论

——评《中国文明源头新探》

周 民 锋

如果有人宣称，中国文明的源头不在别处，而在金沙江两岸的彝族文化中。乍然一听，一定被人视为故做惊人之论。然而，当我读毕提出这一观点的刘尧汉先生的新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却不能不为作者立意之新奇，结论之大胆，视角之新颖而惊叹。

古称百濮之地的云南，果然当得起中国古文明的发源地吗？近年的考古发现似乎有利于这一假设。楚雄洲发现了八百万年前的腊玛古猿，以后又发现了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元谋猿人。贾兰坡认为，云贵川一带最有希望发现两者之间的缺环。《新探》认为，居住于这里的彝族是云南土著，是中国最早先民的遗裔。这一来，只要研究彝族文化，就能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文化的真面目。

但是，应该指出，即使上述说法成立，同样应该区分两种不同情况：第一，彝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直接先驱，在时间上有继承关系；第二，彝族文化仅仅是中国远古初民文化发展的一条支流，它与中华文化有共祖关系。无论这两种情况哪一种得以成立，对彝族文化的研究都可以有助于了解中国文化的童年期。

《新探》提出了彝族文化同道家文化的亲缘关系，读来颇有兴味。

其一，据彝文典籍《梅葛》表明，彝族崇虎，认为天地万物是由虎尸解而生成。按彝语发音虎读作腊、拉、勒、老、李等。彝语支摩梭人称头目为“喇他”，意即虎首。由“喇他”到“拉塔”，再到“老聃”，均为汉译彝音的转换。因此，老子或老聃、李耳，与彝义虎首有关，作为旁证，杨雄的《方言》：“虎——陈、魏、宋、楚之间，或谓李父；江淮南楚谓李耳”。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呼虎为‘李耳’……”方以智《通雅》：虎“或曰狸儿，转为李耳”。这就解开了自古至今争议不定的老聃，李耳的双名悬案。当然，作者未断言老子属彝族。退一步讲，若彝语保留了初民的发音，这对我们理解老聃、李耳的含义，却是价值的。

其二，中国众多的民族都有人从葫芦出的神话。《诗·大雅》亦有“绵绵瓜瓞，民之初生”之句。闻一多认为，伏羲可写成“包羲”，女娲可成“炮媧”，包、炮两字义为匏或瓠，均指葫芦。由葫芦转为“槃瓠”，又转为盘古。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婚礼仪式之一是喝合卺酒，严格的做法应剖一葫芦制成酒器。至今，在哀牢山彝村还留存“祖灵葫芦”，新婚夫妇由巫师破葫芦成两半作瓢饮。

其三，道家尚玄贵左和彝族尚黑贵左，而同儒家贬左尚右相反。

其四，道家的太一与彝族虎图腾的关系。《酉阳杂俎》称“太一君讳腊”，腊字彝义即虎，所以太一是虎。《史记·封禅书》说：“太一，泽山君地长用牛”。引伸开来，太一即虎山之君，虎神。道家竟然也有相似的看法。《路史·前纪·太一氏》称：“道书谓太一君讳臈（腊）。”《吕氏春秋》写：“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名之，谓之太

一。”翁独健在《顾颉刚〈三皇考〉跋》中写：“太一在道教中所占地位实在太复杂了，一方面在教理中占最高位，另一方面在道教神系统中处处见其名号”，“了解太一在道教中的地位，它与各方面的关系，是了解道教的门径之一”。

近年，刘先生研究散见在彝民习俗中的古历。这种历法将一年分成五季，每季分雌雄两月，每月三十六天，一年三百六十天，再加上五至六天作过年日，以彝族向天坟观察北斗星柄指向进行调节。如果用这种古历来解释古籍中若干未解之谜，确实比较圆满。比如，《管子·幼官篇》记载一年有三十个节气，每一节气十二天，最末的五、六天不计其内。而且“幼官图”中载东、南、西、北、中五方、每方分本、副两图，均同彝历相吻合。又如《诗幽风·七月》中提到四至十月后，还有“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郑玄笺：“一之日，十之余也”。有人以为是十一月，按理就该有十二、十三、十四月。显然不通。按彝族十月历解释，指的是一年十月以后剩余的几天。

对中国文化本质的反思应当有一门哲学人类学来考虑这个问题。《新探》一书将民族、民俗、神话、人种、文学、语言考古、考据等多门学科的知识融汇起来，探求中国文明的源头，无疑标志着现代中国的文化人类学的萌芽。前一段的文化研究的不足是，基本上立足于思想史，局限于典籍史料，再说，我国的民族学、社会学未得充分重视，凡此，都造成了文化研究的狭隘和后劲不足。西方是在19世纪以来所积累的大量人类学资料的基础上，综合了其他学科，才有现代的文化人类学，并有力地推进了哲学人类学的发展。要系统而公正地认识我们的民族、我们民族的文化及其在世界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决不是一时一阵的研讨所能解决问题的。再有，近年的文化研究